

透过文学故事，理解经典中国

■ 陈晓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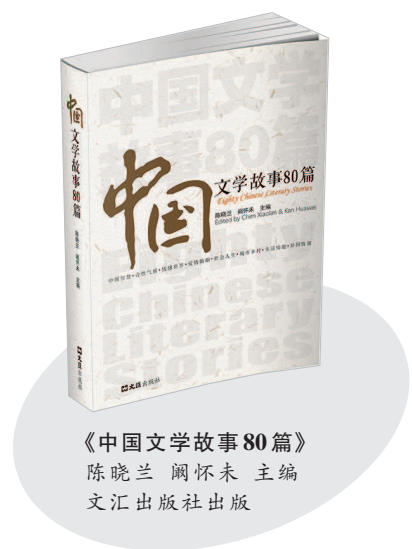
文学经典，作为民族精神、文明精粹和国家文化的载体，不仅是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而且是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相互沟通和同情理解的桥梁，在一个国家国际声望的树立和国际形象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一个国家和人民对于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想象和阐释中，那些具有人类关怀、表现人类共通价值和情感的思想家、文学家，作为各民族的文化英雄，他们创作的精神产品，被视为其所属文明的象征，成为理解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情感世界和审美趣味乃至民族性的重要媒介。

文学经典的海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建构

自古至今，中国的物产或中国风的器物(丝、漆、瓷、茶、园林、艺术品等)、为各种目的亲历中国的旅行者大量的中国书写、中国经典的译介，在不同历史时期西方有关中国的认知、中国形象的建构以及中国知识的再生产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透过中国经典感知到的中国——或曰文化化、经典化的中国，不断修正着物化的、政治化的中国，在中外文明互鉴、中外人民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在1689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游历意大利期间结识耶稣会派遣于中国的传教士，开始对中国事物发生强烈兴趣，他也是启蒙时期欧洲最早尊重儒



《中国文学故事80篇》 陈晓兰 阙怀未 主编 文汇出版社出版

家学说的思想家，他说：“照我们现在的见解，我以为我们道德败坏无限膨胀的时候，差不多必须叫中国的传教士到我们这儿来教我们自然宗教的目的和实习，不应该我们送传教士到他们那里去教他们启示的宗教。”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从中国的经典推断：“中国人所有的行为都以自身和他人最高完善为最终目的。”“中国人努力提倡培养道德风尚，效法以理智为本的大智大悟的前师，前师们崇尚理性的力量，研究如何将这种力量运用到对真理的探求上。”法国哲学家伏尔泰问：“难道我们不借助中国的编年史，就敢随便谈论中国人吗？”歌德在和

席勒通信中论及中国文学：“书里面的人，思想行动感觉差不多同我们相似，我们不一会就觉得自己是同他们一样的人。”文学经典跨越时空，使不同文明的人彼此同情共鸣。

文学经典与国际中文教育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西交通史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接受史，总是与中外政治、文化关系密切融合。早期外国人的汉语学习，偏重古代典籍，辅之以具有现实实用性内容的教材。17世纪以来，西方人出于宗教、政治、商贸等目的学习汉语，一方面需要掌握汉语交际技能，另一方面，迫切希望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古代典籍仍然是其学习汉语的基础教材，同时广泛涉猎中国历史、绘画、建筑、文学，并翻译本国与中国典籍，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教育的理念和方法转向汉语知识的获得和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文学经典在汉语教学中不再占据核心地位。然而，众所周知，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不可分割，语言是交际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脱离文化语境、或者没有文化内涵的语言学习，只能停留在浅层次的工具层面。

近30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

日益提升，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汉语学习的热潮，不同国籍的汉语学习者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外关系中发挥着程度不同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大小及其正负能量，取决于他们对于中国人及其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深度理解。

正如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所说：“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俗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也说：“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联系的，而这多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语言，像文化一样，是由不同年代的各种因素组合而成的，有些因素可以追溯到历史起源之初，有些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文化的变迁会影响到语言，甚至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表达上。”

如何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融合？将语言学习提升到文化理解的高度，如何处理中文国际教育的近期目标、长期目标和终极目的的关系，在掌握语言基础知识和交际技能的基础上，上升到深度了解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与社会现实，并在跨文化交流与沟通中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世界文化多元？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加强文学经典的精读与泛读是重要的途径，古今中外第二语言学习的成功事例已经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中国文学故事，一部文化大餐

正是基于语言学习与文化理解深度融合的理念，也为适应21世纪全球中文学习的热潮和中外文化接触日益密切的现实需要，满足国内外中文教育机构中国文学教学的需求，使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国际学习者通过中文经典著作的阅读，体会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领略中国文学经典的艺术精粹，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增强汉语语言学习的趣味性、艺术性、思想性，我们特编选《中国文学故事80篇》，奉献给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

阅读这些文学故事，会使汉语学习者处在文学世界里活生生的语言现场，体会中国人的交流方式，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与社会现实。通过阅读经典名篇，走近中国古代的先贤，除了孔子，还有老子、庄子、孟子和墨子，初步领略儒家、道家、墨家的思想精粹。中国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诗之国，通过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十位诗人诗作的学习，领略中国人的诗性气质；屈原的愤怒和绝望、陶渊明的回归自然、李白的豪放、杜甫和白居易的沉郁、李煜和李清照的婉约、陆游和辛弃疾的激越。除了世界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还有司马迁、关汉卿、汤显祖、冯梦龙、蒲松

龄、鲁迅、郭沫若、老舍、徐志摩、朱自清、戴望舒、郑振铎、夏衍、巴金、冯至、丰子恺、叶圣陶、傅雷、汪曾祺、史铁生等古代与现代名家的名篇，中国杰出的女作家——李清照、萧红、冰心、林徽因的诗歌、散文，此外还有悲、喜剧，有书信交往，有日记，有警世语录、生活格言等。

透过公元前5世纪至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60多位作家的作品，体验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古代与现代作家关于人生意义、人与自然、社会政治、人伦道德、家国情怀、爱情友谊等人类共通命题的艺术表达，了解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与变革、现代作家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中国文学故事，包含着中国丰富的政治、历史、哲学、经济、社会、道德、风俗、审美、艺术、情感信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仅可以体会社会生活中的汉语，感悟中国文学的艺术技巧和中国智慧的博大精深，而且会产生感同身受的联想，发现本民族文化同中国文化之间的相通与相异之处。正如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所说：“是讲故事的人，梦的制造者，神话的制造者（那是我们的凤凰）代表我们最好的一面，代表我们最富创造性的一面。”封闭的物理世界，借由语言和交流而打开，纷争、战争将世界分裂乃至打碎，心灵的沟通则跨越人为的关隘而缝合碎片。

看中国历史，不能缺一双“海洋眼”

■ 蔡怀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朝宰相魏徵此言，人人皆知，真正的理解者却少。回望历史中的无数次蹉跎，常有“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黑格尔）之叹。

一方面，读史方法有问题；另一方面，很多史没读到。故“读史却不知兴替”。

以中国史而言，海洋史便极少被关注，人们对它的了解，远不如陆地史，可近代困境恰恰源自海洋。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明清屡屡禁海，为何水师建设总是滞后……当葡萄牙人开创线式舰队、炮击为主、轮流发炮的新战术时，东方海军依然保持传统的“跳仓”战法，火炮无法精确瞄准，仅有震慑作用；而明末郑芝龙使用的火船突击、同归于尽的战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仍被当成奇招……

历史不断惩罚忽略它的人，这也提醒着当代读者：海洋史不可不读。

一波才息一波生

不读海洋史，因其难读。一是史料少，二是多中心，三是常变化。不像陆地史，给人以清晰的从上到下（或从中心到边缘）的秩序感，从古到今的线性感，只是这秩序感、线性感多由人造，易成认知枷锁。

该怎么读海洋史？葛兆光先生的《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亚海域为中心》为我们提供了门径。这本书是课堂讲义，深入浅出，重在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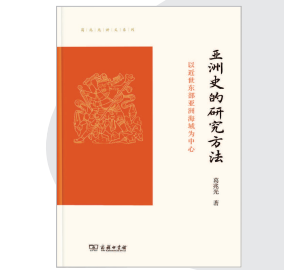
从陆地史看“忽必烈东征日本”，只是“小事件”，意在消化南宋降兵，败于风暴等“偶然因素”，影响有限。可从海洋史看，元朝是“人类史上首次全球化”，它将不同文明纳入统一时间，即：“如今日头出的地方，日头落的地方，都是咱(们)的。”这是一次格式化、中原传统儒家社会结构(土农工商)亦遭瓦解。“东征日本”是世界史扩张的必然一步，它的失败激发了日本、高丽的民族意识，使“后蒙古时代”从“合”又转向“分”。

再如“万历援朝战争”，从陆地史看，明朝、日本、朝鲜三方博弈，明朝消耗国力，亡国亦与此相关。但从海洋史看，葡萄牙人、暹罗人等都试图卷入，目的是修改明朝为中心的“朝贡-贸易秩序”，日本挑战失败，转向锁国200多年，而保留旧秩序的代价是，在大航海时代一错再错。

其实，海洋史的材料并不少，本书介绍了朝鲜使节的《燕行录》，越南使节的《朝天录》、日本的《华夷变态》等，皆为巨制，另有碑刻、个人文集等，堪称浩瀚，许多细节让人耳目一新。以道光皇帝为例，正史较少提到他的相貌，官方绘图亦无大异，但越南史料称他“春秋四十五，而齿已尽落”，朝鲜史料也说他“齿尽脱”。可知所谓史料少，实为阅读少，而无知必有代价。

站在海洋史的角度，才能真正体会到“一波才息一波生”，历史盘根错节、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亚海域为中心》 葛兆光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 杨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历史看海洋：东亚海域交流300年》 [日]羽田正 著 张雅婷 陈健成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此消彼长、互为因果，没有永远的中心，只有永远的流动性，勇于求变，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本书寄托深重，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之况味。

不受帝国保护的商人

“于是国王(亲自)前往中国，他杀死了抵抗者，将那里洗劫一空。”在塔巴里《历史》中，记录了也门国王“征服”中国的故事……

各国早期史中，不乏“先前阔”传说，正是这些传说，激励商人们不避艰险去开拓。早在公元713年，阿拉伯贸易使节已前往唐朝，8至10世纪，阿拉伯海商主导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地丝绸之路常有战争不同，海上丝绸之路持续和平，印度洋上的商船很少携带武器。

在《东来西往：8-13世纪初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中，作者陈焯轩呈现了与“大航海时代”迥异的图景——“仗剑经营”者，亦无“半商半盗”，政府很少参与海商经营。阿拉伯海商聚居在各港口，与当地商人合作，东南亚诸国来华“贡使”，多由阿拉伯海商充任。黄巢之乱，广州城10多万阿拉伯海商罹难，只好迁往马来半岛的吉打，后逐渐迁回广州，又遇依智高叛乱，损失惨重。

11到13世纪，宋朝海商成海上丝绸之路的主体，埃及、印度、东南亚……中国船占大多数，宋朝海商亦持阿拉伯海商的规则，只做“不受帝国保护的商人”，却忽略了阿拉伯海商的另一面——勇于冒险，在相当长时期，少有人能两次到中国，依然前仆后继。

宋朝海商落入阿拉伯海商同样的困境：大环境宽容，生意发达；大环境逼仄，陷入衰退。他们不想惹麻烦，可在传统社会，海商的流动性天然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苏轼便指责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间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

宋朝中叶始，沿海船民被编入海船户，此后政府的宽容政策屡遭各种原因打断。“置身事外”未能保障崛起的宋朝海商，因一次次错过历史机遇，王朝与海商走向双败。

历史无限复杂，亦有恒数：效率高于恒胜，效率低者恒败。无尽委屈，无数借口，都无法改变大趋势。阿拉伯海商东来，宋朝海商西往，皆在此基本律上行走。本书勾勒出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史的草蛇灰线，给读者别样的启迪。

寻找遗失的印度洋记忆

“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千。”宋代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这样写道。龙涎香是抹香鲸肠道分泌物，只产于印度洋，宋商主导海上丝绸之路时，宋徽宗“青楼贯之，佩于颈”。郑和之后，中国海商退出印度洋，龙涎香渐成传说。

在《人海之间：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中，作者杨斌钩沉了嘉靖皇帝与龙涎香的故事——嘉靖沉迷道教，急需龙涎香“斋修”，不惜高价购买，却“十多年来一无所获”。1556年，嘉靖甚至发动全国力量采办，勉强凑了2斤多，到1560年，才发现其中多数是假的，仅一两块是真的，还是从葡萄牙人手中买来的。此时葡萄牙人已掌控印度洋航线，只有他们才能找到龙涎香。靠龙涎香，葡萄牙人得以占据澳门。

《明史》指斥嘉靖荒淫，却未深究“受制于人”的原因。

从陆地思维看来，守成胜于进取，所以刘大夏敢于将郑和档案“取而焚之”(此说真伪仍有争议)，终至印度洋“渐渐地和中国越行越远，越来越模糊，乃至隐而不见”。

本书意在找回遗失的“印度洋记忆”，从宋代沉船“泉州一号”，到唐代阿拉伯沉船“黑石号”，乃至南宋沉船“南海一号”，皆证明中国和印度洋曾有过的紧密联系。

此外，贝币在中国流通上千年，明代南京有专门的贝币库房，而流通用贝币只产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西游记》中的人参果，宋代制造的无钉海船，乃至明人对马尔代夫“海港爱情”的曲折描绘……它们在杨斌的笔下，皆成通往过去的线索。

本书由21篇专栏文章组成，胜在多姿多彩，从不同侧面呈现历史的丰富性——中华文明亦向海而生，找回海

洋中国的记忆，才能完整呈现它的风采。

海洋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宋代理学家程颐曾向老师发问：“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大地安在甚处。”

程颐之问的背后，是巨大的恐惧：我们所知的一切，来源皆可疑，却很少被追问、换言之，处于怎样的氛围，就会有怎样的意见，欲破定见，必先破氛围。羽田正的《从历史看海洋：东亚海域交流300年》即破围之作。

本书截取东亚史的三个百年，据海洋史的逻辑，分成三个阶段，每阶段都有它的中心任务，身处其中的中、日、朝三国，种种变化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历史的“规定动作”。

在开拓海疆阶段(1250-1350)，不论南宋“向海立国”，还是元朝启动海漕，乃至日本南北朝终结，高丽与元朝的海道往来加强，均为陆地海洋的跃迁。

在相互争夺阶段(1500-1600)，明朝实行海禁体制，日本自建朝贡秩序，“万历援朝战争”将东亚三国卷入其中，而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也加入竞争，东亚海域与“大航海”相接驳。

在分疆共存阶段(1700-1800)，清朝“一口通商”，日本“闭关锁国”，朝鲜“闭关自守”，在对抗“大航海秩序”的同时，彼此仍保持着交流与好感，互相救助船难渔民，却在政府层面保持冷漠。

三阶段起伏跌宕，但中日、中朝、日韩航路几无变化，各港均有对方侨民……可见，必有一种共识贯穿其间，基于它形成的认知，犹如大地，托起了历史，却难被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洗礼后的现代人理解。当现代人感慨“假如当初如何，则现在会如何”，当彼此执着于“这是我们的原创”，当“我为何如此不同”被反复提起……历史便偏离了海洋视角，“历史的垃圾时间”反而成主角。

本书的价值在于给读者一双看历史的“海洋眼”，字里行间，透露着深切的关怀：我们真地搞懂“大地安在甚处”了吗？如何不被叙事快感迷惑，体悟历史的真逻辑？

使历史有一些些新的生命

——谈蒋玄怡著《中国绘画材料史》

■ 张生

宗白华先生曾说，中国的绘画可以与希腊的雕塑和德国的音乐相媲美，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文化的三大事件之一。而对于我们来说，对具有悠久历史的

中国绘画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多年来人们对于中国绘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其美学的特点与技法等方面的研究，如宗白华就是对其空间和意境等进行研究，但对其“材料”的研究，如笔墨的制作、纸张的加工、颜料的使用等却付之阙如，但这也是中国绘画得以存在的基础，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绘画的特点及美学风格，所以对于书画的材料研究，对中国绘画的历史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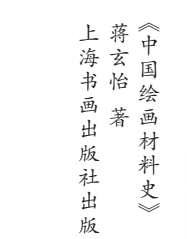
蒋玄怡先生(1903-1977)《中国绘画材料史》就是一部研究绘画材料的开创性的著作。蒋先生1927年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与李可染等是同学。1930年考取公费留学在东京大学学习雕塑，50年代以后就到同济建筑系任教师，直至退休。他对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考古领域，对陶瓷、漆器、玻璃、铜镜等艺术多有探讨，所著《长沙：楚民族及其艺术》影响巨大，书中曾第一次将木俑、漆器、绢画等印出，因此徐悲鸿称赞言：“中国古代美术史可由此重写。”同时，因为他自己是画家，对中国艺术有深入的了解，这让他

在思考中国艺术及其材料问题时，别具只眼。

这其中，蒋先生对宣纸的鼻祖即著名的“澄心堂”纸的考证尤其引人入胜。该纸素为历代书画家推崇，是南唐时期用于书画的专用纸，曾有“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之誉，但到底何时创制、原料为何却众说纷纭。他经过钩沉史料，指出“澄心堂”纸并非始于雅爱艺术的南唐后主李煜时期(962年)，而是在其祖父南唐先主李昇时期(942年)前就已经开始制作，澄心堂也是他所建造的闲居之所，澄心堂纸也由此成为皇家用纸的代称，也因此，后人更是珍若拱璧。他还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爬梳，提出书画用纸和宗教用纸的区别，认为前者为白色麻纸，后者为黄色麻纸。以此为基础，他又进一步把作为材料的纸的质地对书画的美学风格的影响联系起来，因为宣纸多为楮树的树皮制作，而北方的楮树较少，质地也没南方的柔软，还以麻皮等混入制作，加上方法也不精当，所以纸张比较粗厚，但是也因此“遂成六朝北碑之雄健作风”。南方则因为纸张制作精良、光滑，所以也形成了优美的风格。

这也是南北朝时期“北碑南帖”不同美学风格的成因的一个别出心裁的解释。此外，他还据此解释了画幅的式样与材料的关系，如《女史箴图》等卷式绘画就与其材料为狭长的绢素有关。唐以后随着造纸术的发展，纸的面幅变大，画幅也才发生了改变，这些分析也都让人叹服。

而蒋玄怡之所以有这些独到的发现，与其对待学术的态度密不可分。他认为“依附于人，必无成就”，因此他坚持自己的思想的独立性，做人、作画与研究都力主依靠自己的思考，不轻信已有的旧说，努力说出自己的看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有勇气翻掉这个巨大的历史车轮。如有可能，我要注释这些历史，使历史有一些些新的生命”。而仅从他对中国书画材料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出，他做到了这一点。也正因此，尽管他也经历了时代的风浪侵蚀，但却依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绘画材料史》 蒋玄怡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汉·太一将行图，马王堆出土，绢本